

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s Desk

文化建设中不能再阉割西学

黄保罗

(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讲座教授,吉林·长春,130012)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如何通过文化建设来构建其软实力,既关系到中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又关系到中国社会能否和谐,还关系到中国能否获得和平的国际环境。在这场文化建设中,资源主要有中(国学)、西(学)、马(克思主义)三个方面。

以前笔者曾通过构建“大国学”来解构狭隘的国学,^①现在要强调的则是:“文化建设中不能再阉割西学”。

“马”是首和官方意识形态,带有政治统治力量。代表中国传统的“中”和西方传统的“西”是两翼,对“首”常显顺服与服务之态,且有时出于自信或争宠还会互相抹黑对方。这里涉及的核心,一是忠心与否,二是有能力与否。

肤浅的中西之争一般是,国学者批评西学者为崇洋媚外的“汉奸”,西学者批评国学者为狭隘无能的“土鳖”。国学热衷者往往排斥西学倡导者为“其心必异”的“非我族类”以唤起草根的盲目民族主义排外情绪,却在全球化已成现实与中国已为世界经济强国的语境中逐渐失去了说服头脑清醒之当权者的能力;因为已在强大的中国,自信心已经增加而并不担心所谓的“非我族类”,同时为了获得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更加注重把自己塑造成包容与开放的形象。因此,中国政府所关心的主要是西学能否帮助中国解决自己所面临的挑战与问题。西学热衷者一般不会挑战国学倡导者的爱国之心,但却常常批评其因为迂腐和无能而最终伤害自己的国家与人民。

比较理性的论争则主要集中在西学与国学的“能力”之上,即在中国需要经济上继续发展、国内需要和谐、国际上需要和平这三件“硬件式”的大事上,国学与西学各自能贡献什么“软实力”?

自从工业革命兴起以来的几百年里,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语境中,中国传统国学已经失去了支持中国发展经济、获得和谐社会与和平国际环境的能力;真正让中国“站起来”和“富起来”的,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国学者与西学者争论的是,“马”领导的中国经济上已经强大,但文化、道德、与软实力等方面遇到了挑战,今后谁应该与“马”一起担任核心?在笔者看来,无论是批评西学的国学者还是为西学辩护的西学者,实际上所看见的都是被阉割了的西学,而不是真实与完整的西学。

西学的古代传统主要有二,一是希腊哲学与神话传统,二是希伯来及基督教传统。自基督教兴起之后,整个欧洲都处于其影响下,希腊文化几乎被完全淹没。直到中世纪,随着拜占庭文化流入欧洲,古希腊的一些文化财富才重新被人关注而产生了文艺复兴,但它并没有根本动摇基督教在欧洲思想与精神领域的统治地位。经历了16世纪的宗教改革之后,西方的基督教分成新教与罗马天主教时,欧洲诸国的国家与民族意识逐渐被唤醒。而真正对基督教传统构成了致命挑战的,则是经历了启蒙

^① 见黄保罗 Huang Baoluo,“从欣赏视角看体现中国软实力的大国学”*Gong Daxue shijie lun jianshe Zhongguo ruoshili de da-xue*[The Great Gansuo, which reflects Chinese Soft Power, in the perspectives of Europe and North-America],载《中国社会科学报》*Zhongguo shehui kexue bao*[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2010年3月4日,第68期第13版域外。

运动时代而诞生的以人之理性为核心的思想与精神体系。但是,基督教并没有被摧垮或消灭掉,结果是在基督教与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特征的世俗主义之间达成了一种“政教互不干涉”的妥协。从此,基督教的活动被局限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与个人生活(Individual private life)层面而注重精神和形而上领域,而以理性主义为本质的世俗主义则活跃于政治、国家与大众媒体之中而注重物质与形而下领域。

正如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古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在他著名的演讲《西方会成为人类的普世模式吗?》中指出,现代西方建立在资本主义(capitalism)、议会民主制(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和基督教(Christianity)三个轴心之上,即:以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为核心的经济关系模式、以普选和代议制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模式与以基督教为核心的精神生活形式。^②也就是:经济生活的生产与流通方式,政治生活的组织形式和精神生活的个人皈依形式和意义建立形式。^③这成了西方现、当代的核心价值观,其实它们是希腊传统、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社会进化论、和犹太教/基督教的混合产物。

其中为人类物质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资本主义也带来了纵欲主义、冷漠、残酷与弱肉强食的侵略性,它主要来源于以人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其本质是反对神权的启蒙运动所产生的人文主义(humanism)的极端发展之结果。

民主政治模式则与古希腊传统和近代契约论都有关系,其长处是发现了人性的罪恶并以民主的方式对之进行约束限制,其短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理论基础(即人类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最好的以及人类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做出正确的政治决策)常常是不可靠的,因为从基督教的人皆罪人的视角而言,人类是无法拯救自己的。

因此,西方的经济模式与政治模式,都是长短并存、优劣共在。夸张地说,西方社会今天的物质发展和技术革新主要得益于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等人学传统,而精神颓废、家庭破碎等软件体系方面出现的灾难则主要因为对基督教的背叛。此论虽有极端之嫌,但西学内部的人学与神学之间的密切联系与紧张冲突,是欧美社会的客观现实与特点。上述二者虽有很多令人不满意之处,但在目前世界各国的经济与政治模式中,似乎它们仍然是较好的;所以,二者并没有导致西方社会的崩溃。西方社会之所以今天虽有许多消极之处,却仍然是世界上最令多数人羡慕的社会,其原因在笔者看来,主要就是它们的西学中还有第三个元素,即基督教。

近百年来,当中国被以西学传统之人的洋枪洋炮打得羞愧难忍之时,国人只注意到了西学中硬件的厉害,而没有充分关注其软件体系中的长短优劣之处。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及民国早期,深受西学之启蒙运动反宗教思潮的影响,蔡元培、陈独秀等人极力反对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认真地学习、研究与教导宗教或神学。因此,除去明末清初利玛窦等天主教传教士与中国的平等友好交流,给国人留下屈辱之感的西学,实际是以弱肉强食的人学为根基的,它所代表的只是西学中启蒙运动以来反对基督教的人学传统,主要是预忤与负面的,虽非常强大,却并非令人完全愉悦。

所以,近百年来,国人对于被阉割而只剩下人学部分的西学传统的态度,大致分成如下诸类:一则排斥西学的全部,就是其中的技术(实学)也加以拒绝;二则主张“师夷之长以制夷”,主张学习西学中的枪炮武器等技术层面的东西以期直接有益于中国的硬件建设;三则主张在西方的技术之外,还应学习西学中的经济模式与政治模式以期有益于中国的软件建设,即使是主张全盘西化与极端自由主义的人们也往往仅限于此第三境界。总而言之,主张学习与接纳西学者,无论是学习硬件还是学习软件

② Maurice Godelier, *Wird der Westen das universelle Modell der Menschheit?* Wien: Pingu Verlag, 1991.

③ Yang Xuehong (杨德生), "The Transcendental Dimension of the Age of Disenchantment: The Paradox of Relig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China",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 No. 1, Helsinki: Nordic Forum of Sino-Western Studies, 2011, 27-38.

者,他们所关注的其实也只是其中的人学传统而已,而并没有认真对待西学中的基督教神学传统这一精神层面的东西。因此,当西学在中国出现与发展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被阉割了的不完整的学术体系。

西学中的资本主义与代表制的民主政治,都是以人性的真实性为根基的,因此它们能在经济上调动人的积极性,在政治上朝着多数人的利益而努力;但这种人性的真实性之本质其实就是自私性,因此,经济上出现繁荣的同时也会有纵欲与贪婪,政治上努力为多数人谋利益的同时也会产生自私与盲目。人成了一切根基与标准,而人本身却象一匹脱缰的野马,到处疯狂地奔驰,哪里有好处与利益,这匹马就奔向哪里。但这种疯狂还没有在西方导致失序,因为民主代表制通过妥协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实践基本保证了至今而面临金融危机的欧美各国仍然处于相当的和谐与稳定之中。可是,经济发展与政治公平确保给人的生存、平等与自由,却在一定程度上将人带入了虚无与意义缺乏的境地,这是经济大发展、社会大稳定之后的欧美社会所面临的巨大的后现代挑战,而填补这块空白的就是基督教这颗救心丸。因此,资本主义这匹脱缰的野马,之所以没有导致欧美社会的失序,是因为有民主政治这条缰绳在时时套紧它;被套住的野马虽然外表不再疯狂,可内心世界却面临虚无与意义缺乏的折磨。基督教则象救心丸一样,一方面从社会秩序与制度的层面,呼吁与唤醒人类的良知以降低野马疯狂的风险度,另一方面又从意义的提供者之角度为内心空虚之人提供慰藉与方向。这颗救心丸平时不需要,危机时却总起关键作用,如911恐怖袭击、亚洲海啸、大地震及世界金融危机等灾难发生之后,平时已显空荡的欧洲教堂就往往会充满前来寻求精神帮助的人群。

所以,百年来,中国先后经历了多个阶段,直到1980年代以来,国人中最主张学习西学的自由主义学者,其实仍然首先强调的是科学与技术等能在硬件建设上立竿见影的西学;其次是经济模式方面的东西;再次乃政治模式方面的民主、人权、平等、法制等内容;而至于西学中的神学传统对上帝之权威的敬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爱,提倡与学习的并不很多。这是近百年来国人的西学所具有的主要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主要关注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人学传统,部分或全部忽略以基督教为核心的神学传统。在大力提倡文化建设与繁荣发展的今天,我们学界应该意识到,狭隘的国学会误国误民,被阉割的西学也同样贻害无穷。一则这种被阉割的西学并不符合真正西学的实况,二则此类被阉割的西学无法解决中国问题而成为中国的软实力。

本期“人学、神学与国学”专栏收录了中国人民大学何光沪教授的“当代中国的国家信仰与宗教信仰”与燕京神学院陈驯博士的“筷子神学”,前文发表于2011年在赫尔辛基大学举办的“国学与西学论坛”,后文发表于2011年的香港道风山论坛,二文从政治和文化的视角论述了汉语语境中的神学。“实践神学与中西教会和社会”栏目收了美国神学魏克利教授的“冷战宗教:冷战对中美宗教的影响”和华东师范大学宗教社会学家李向平教授的“基督教与中国公民社会——以中国基督教组织的运作模式为中心”,前文发表于中国社科论坛(2011宗教),后文发表于2011年赫尔辛基大学举办的“国学与西学论坛”,二文从社会学的视角论述了基督教及其神学在中西社会与教会的情形。“中西经典与圣经”栏目则收录了美国圣经公会彭国伟博士的“在一个追求和谐的社会里来阅读《启示录》”和爱尔兰独立神学家施文博士的“保罗追求的和谐社群”,二文均发表于2010年北京大学与牛津亚洲宗教文化研究院举办的“和谐社会与古代圣经”会议上,他们专门探讨了圣经经典。“教会历史与中西文明变迁”栏目特约了四川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建明教授撰写“基督徒支持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的原因”,广州暨南大学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专家陈才俊教授撰写“英国传教士对晚清鸦片贸易的态度与行动”,二文以历史材料为根据论证了基督教及其信徒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积极贡献,对于厘清基督教及其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被误解有重要意义。“比较宗教文化研究”栏目则收录了武汉大学哲学院副教授苏德超博士2011年发表于赫尔辛基大学“国学与西学论坛”的“金规则:拉平基督宗教与儒家”,与澳门圣若瑟大学的奥地利神学家田默迪教授于2011年发表于兰州大学第三届“和谐社会与宗

教文化学术会议”上的“以广阔历史视野看中国与西方关系之个人洞见”。前文以比较宗教学的理论分析了儒家与基督教的异同,后文以比较宗教学的理论分析了个人的实践经历。最后还收录了美国世华研究中心主席戴德理博士的书评“体现当代神学与文化运动的汉语神学”,浙江大学张新樟教授的“弘扬共同体理念,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宗教与中国社会伦理体系的构建”学术研讨会综述,与本刊执行编辑、金陵神学院教师陈永涛的会议综述”“第一届国学与西学北欧论坛简讯”。

2012年春天于芬兰赫尔辛基

The English Title:

The Western Studies Should not be Castrated anymore i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Paulos HUANG

Ph. D. & Th. D., University of Helsinki; Post-doctor, Tokyo University

Kuang Yaming Distinguished Chair-Professor, Jilin University, 130012 Changchun, Jilin, China

Editor-in-chief,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

Adjunct-Professor, University of Helsinki

Email: paulos. z. huang@ gmail. com